

品读革命精神

张 轶

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
里，《喜阅》馆刊也用自己的方式庆祝党的百年华诞。为了让广大
读者品读百年中国革命奋斗历程，成都图书馆在微信公众号上特别
推出了馆藏“红色文献”书目，本期《喜阅》也特别推荐了馆藏红
色报刊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四种报刊，分别是《新青年》《解放》《群
众》《新华日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直接或间接领
导出版了大量红色报刊。这些红色报刊真实记录了中国共产党走过的
光辉历程，体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压迫、奋起反抗的革命斗争精神
和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在革命战争年代，它们是红色
基因、红色文化的传播者和记录者，发挥着宣传党的理论、凝聚人
民力量、打击瓦解敌人的作用；在当今和平年代，它们是红色基因
、红色文化的见证者和传承者，有助于党史研究、增进爱国爱党
情感、增强文化自信。

在采选本期《喜阅》的用稿时，我欣喜地发现有很多读者是以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主题来抒发自己的爱国爱党之情，或回
忆峥嵘岁月，或品读红色书籍，或表达强国信念，整个邮箱也因为
这些稿件的出现而变得热烈火红起来。

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读者能够阅读红色经典，更能够从中体会
革命的精神，生命的本义，从而汲取到强大的精神力量。

张轶，成都图书馆区域合作与事业发展部，《喜阅》编辑。

读书当旁搜远览，博通天人，庶几知上下
古今之变，而卓然成家。若仅仅以辞句相夸
耀，非所以励实学也。

——[清]胡林翼

《喜阅》2021年第4期（总第62期）

主 编：胡建强

责 编：张 轶

主 办：成都图书馆 成都市图书馆学会

地 址：成都市青羊区文翁路98号（610041）

电 话：028-86120189

主 页：www.cdclib.org

微 博：<http://e.weibo.com/cdclib>

<http://t.qq.com/cdclib>

邮 箱：cddfwx@163.com

发 刊：2021年7月1日



成都图书馆官方微信公众号

目录

CONTENTS

观 澜

- 馆长荐书（三）：《二泉映月——十六位亲见者忆阿炳》
01/肖 平
初心种子终成林
04/茅震宇

书 缘

- 《星水微茫驼铃远》，感受那一代人的精神温暖
07/周 洋
思考人之所以为人
10/夏学杰
古典植物在文学的土壤开花
13/钟 芳
“与编辑书”中的温情表达
16/刘学正

赏 读

- 奔跑吧，一百里！
18/仇进才
唐朝的鱼
21/邱俊霖

漫 笔

- 我与成都图书馆
26/刘春霞
竹床上望夏月
29/宫风华
奶奶的“字典”（外一篇）
31/蓝月凤
唯有书与老公不可外借
34/罗 鸿
小屋的回忆
36/甘国栋

我 们

- 成图“红色文献”推荐
/封二
成图“红色文献”推荐
/封三

刊名题字：流沙河
封面设计：王承佳

馆长荐书（三）：

《二泉映月——十六位亲见者忆阿炳》

肖 平

瞎子阿炳留在世间的照片只有一幅，还是从他的户籍资料里找到的：小而模糊的黑白照片中，阿炳戴着一副左右倾斜的墨镜（由于镜架损坏），墨镜一上一下遮住他的眼眶，使他的眼睛看起来像两只无底的黑洞。我久久凝视他的双眼，试图看清这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杰出音乐家双眼所蕴藏的秘密，然而看到的只有虚无与沧桑。

阿炳原名华彦钧，小名阿炳，江苏无锡东亭小泗房人，生于1893年阴历七月初九，卒于1950年阴历十月二十五，享年58岁。阿炳的父亲名叫华清和（号雪梅），是无锡洞虚宫雷尊殿的当家道士，母亲是一名姓秦的寡妇（一说姓吴，一说姓严，一说姓陈），可惜在阿炳出生一年（一说三年）就去世了。

阿炳从九岁开始跟随父亲华清和学习道教音乐和民族乐器，由于他有很好的音乐天赋，又长得一表人才，演技十分出色，故被誉为“小天师”。作为一名职业道士，阿炳必须掌握多种道教音乐曲牌和民间小调的曲调，这样才能在斋事活动中受到大众青睐。本来雷尊殿的香汛很不错，“一年一度的香汛香客留下的锡箔灰、香烛、香钱是雷尊殿一笔好收入，一般可供当家住持吃两年。”可是好景不长，阿炳父亲去世以后，他不幸染上吸毒宿娼之恶习，导致经济入不敷出，双眼先后失明，最终沦落为走街串巷的街头艺人。

据本书的当事人回忆，阿炳第一只眼睛大约是27岁时失明的，

到35岁又瞎了另一只眼睛，从此成为双眼全瞎的盲人。关于盲人的世界，我曾在博尔赫斯的传记中有所领悟：盲人的世界其实并非一片黑暗，而是少了某种色彩，多了某种不确定性。也许他们的世界是灰色的，像寒冷冬天下个不停的雪。

阿炳有过前后两任妻子，都是社会底层饱受苦难的可怜妇女。前妻名阿珠，是一个被大户人家遗弃的“妾”。后妻名董催弟，因前夫贫困而死，遗下两个儿子，两个女儿，抗战前夕改嫁给阿炳。当时的人们还记得：在无锡黄昏的街头，董催弟牵着阿炳上街卖艺，阿炳标志性地戴着一副黑玻璃眼镜，胸前累累赘赘挂着笙、笛、琵琶等乐器，手里拉着胡琴或拿着三根竹片。那时候，著名的《二泉映月》已经被阿炳演奏得炉火纯青，当寂静而荒凉的胡琴声穿透无锡的黑夜，似乎人生的悲凉已从阿炳的指间流向了广袤的大地和苍凉的夜空。

阿炳的音乐才华跟他一生的遭遇密不可分。1950年盛夏，中央音乐学院杨荫浏教授来无锡为阿炳演奏录音，阿炳十分感动，说：“我荒疏太久了，让我练上三天，再演奏吧。”原来阿炳已经有两年多时间没有摸过胡琴了，问他不奏音乐的原因，他说：“两年以前，一个夏天的日子，我到街头演奏，忽然一阵大雨把我的身子和乐器打得通湿。我在雨中行走的时候，一辆人力车把我胡琴上的蛇皮戳穿了。同一天夜里，老鼠咬断了我胡琴弓上的马尾。一天一夜中间，接连碰上不幸的事情，从此我就再也不敢动手演奏了。”

当天晚上，杨荫浏教授一行从乐器店借来一把新的胡琴和一把新的琵琶，小心翼翼交到阿炳手里。三天以后，钢丝录音录下了阿炳演奏的六首曲子，它们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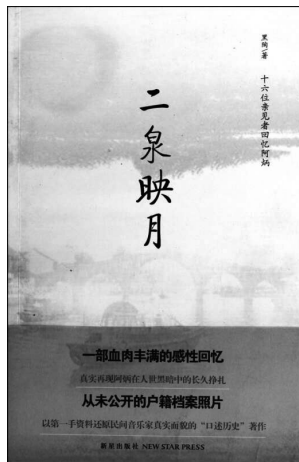
琵琶独奏曲：大浪淘沙、昭君出塞、龙船

胡琴独奏曲：二泉映月、寒春风曲、听松

聆听这些饱含深情的音乐，似乎可以感知阿炳心灵的颤动和人生不变的归宿。1950年9月，中央音乐学院打算邀请阿炳去音乐学院开《二泉映月》和《听松》音乐会，并聘请他去中央音乐学院任教。但此时的阿炳已经卧病在床，沉痾不起，于当年12月4日吐血逝世。

《二泉映月——十六位亲见者忆阿炳》为这位杰出的盲人音乐家勾勒出一幅幅人生画像，尽管每个人的叙述不尽相同，甚至有矛盾和出入，但它们仍像一组和谐的音符，完整地勾画出瞎子阿炳苦难而辉煌的音乐人生。

本文作者：肖平，成都图书馆馆长。



初心种子终成林

茅震宇

翻开奚旭初的长篇小说新作《信仰》，浓浓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芦花村老支书韩伟才与妻子林月娥摇着小船唱着山歌接儿子和准儿媳回家，小船穿行过璜泾镇上那一座座石桥，行进在荡茜河碧波之中，除了人和芦花村是虚构的外，太仓、璜泾以及地名、建筑、山歌全都是写实的，鲚鱼饼、老白酒、芦粟、糖水鸡蛋，都是很太仓很璜泾的。养蚌育珠、芦席编织、蒲包手袋、蟹苗养殖也都是太仓沿江地区过去很多的副业。韩伟才儿子韩芦生是即将转业的正营职干部，韩芦生未婚妻肖紫枫是济南的中学教师，紫枫那在济南当局长的父亲已给准女婿定了一个好职位。而犹豫再三的紫枫后来能下决心调到璜泾，正是这第一次随芦生回家，就被这璜泾古镇的江南风韵和浓浓乡情亲情所吸引，当然还有芦生那改变家乡贫困落后面貌的“五年之约”。

小说中不仅县乡地名都是真实存在的，连东郊革命公墓、璜泾中学和西塔、荡茜河等全都是真的，甚至第一招待所内的九曲桥、六角亭、银杏树及其方位也全都是实实在在的。马刚马强兄弟在街上贩卖蒲包手袋被工商管理人员诓进去并处罚，这样的事今天看来不可思议，但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却是“正常”不过的事。还有，潘羽洁入党政审中发现她父亲的表妹嫁给了国民党的一个团长，又去了台湾，这让入党心切又十分要强的潘羽洁倍受打击。这些细节也使小说的真实感倍增。

当然，小说就是小说，如果把《信仰》当成纪实文学来读，那就反倒有损作品的艺术魅力。这部长篇小说的谋篇布局很有独到之

处，作者在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间从容不迫地交替，让叙述角度灵活切换。“我”的叙述是串联全篇的纲目，有点像影视中的旁白，画外音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又增添了作品真实感和可读性。在“我”的父母到底是谁这个问题上，就吊足了读者胃口。开始会想当然地以为是韩芦生与肖紫枫这对“神仙眷侣”，后来作者又透露说潘羽洁才是“我”的亲妈，读者又容易想当然地认为韩芦生该是亲爸了吧，却想不到又杀出个廖志飞才是亲生父亲，到后来又峰回路转，城乡差别让韩芦生与肖紫枫、潘羽洁与廖志飞劳燕分飞，而志同道合又让韩芦生与潘羽洁有情人终成眷属。

韩芦生对爱人、对芦花村的爱和执着，两者交织在一起，又交相辉映，使英雄人物不仅高大而且可亲。在上面号召分田到户时，韩芦生能顶住压力拒绝跟风，在塑料制品厂出现污染时，又主动对邻村赔偿，并坚决果断地关停该厂。这反映出了韩芦生实事求是、大公无私、勇于担当的高尚，而在肖紫枫因惧怕露天茅房要求改造时，韩芦生说：“所有的农户家里都是露天茅房，我如果砌个砖头茅房，可能影响不太好。”这初看有点不近人情，但细想起来，也符合韩芦生的性格，与他放着村里汽车不用，骑摩托车送母亲上医院的“死板”都是一脉相承的，也正是这样严以律己，他才能无私无威地打开局面，又不怕被人举报诬陷，同时这个细节也成为肖紫枫离开璜泾的合理性伏笔。

《信仰》中出现了40位苏州知青，着墨较多的有七位，其中潘羽洁更是倾力塑造的一位知青代表，用当年的话可能叫“铁姑娘”，用现在的话能称为“女汉子”，但作家却都没有动用这两种概念，而是用她与同为苏州知青的廖志飞的恋爱生子，后又与村书记韩芦生重组家庭的情爱纠葛，特别是她一次次放弃回城、提干、调动，扎根农村、坚守芦花村的执着，与韩芦生等一班人为改变芦花



《星水微茫驼铃远》，感受那一代人的精神温暖

文/周 洋

新近收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周立民新著《星水微茫驼铃远》。书中收入的六篇长文，曾以“星水微茫”的专栏名在《收获》杂志上连载，书写了沈从文、卞之琳、李健吾、梁宗岱、方令孺和萧乾等六位知识分子，他们众所周知的身份是现代文学史上响当当的作家、诗人或翻译家，却又不限于此，跟随周立民的文字，走进他们的世界，会发现这是富有独特精神气象的一群人。

开卷第一篇《沈从文：失去方向的风筝》，写的是沈从文鲜为人知的人生轶事，正是我所爱读的内容。近几年，关于沈从文的各类书籍真有如过江之鲫，很是带动了一波阅读热潮。但周立民的写法自有其与众不同的精妙之处，他充分发扬自己在巴金研究领域日积月累的深厚造诣，以沈从文和巴金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友情作为主线，饱含深情地讲述了两位历经风霜的文化老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命运浮沉。他善于捕捉历史的细部，常在那些易被人们忽视的小微处着墨，生动形象的笔触让文字有一种画面感，读者仿佛打开了一部尘封多年的纪录片，随着镜头的缓缓移动，颇有身临其境之感。譬如，他写巴金1985年3月在北京拜访沈从文，这是已届耄耋之年的两位老友在晚年十分难得的一次晤面，因为年事已高加之疾病缠身，两人已不能像年轻时那样畅快地交谈、无拘无束地辩论，代之以沈从文先生“由于说话不便，嘴唇很吃力地颤动”，巴金先生则“突然沉默”“觉得有什么东西塞了咽喉”，辅以书作者精心挑选的若干幅老照片，立刻产生一种时光倒错的感觉。周立民这样写道：

村贫穷落后面貌、帮助村民脱贫致富的桩桩件件，成功地让这位女性形象丰满生动了起来。

从人物划分上分，《信仰》可以说是复员退伍军人类题材，也可以是知青类题材，从内容上分，则可以是脱贫、小康类，也可以说是励志奋斗的红色类，甚至从地域方面来说，也可以说是江南风情类。其实，文艺作品类型化并不十分科学，也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没必要划那么清。奚旭初下过乡插过队，回城后进过厂，又接受了高等教育，还当过检察官、外经委干部，主持过地方史志工作，在文联又分管文学、主编杂志，丰富的经历让他的作品多姿多彩，但他的写作又保持一大特点，那就是每部作品主基调总是积极昂扬的，就像《信仰》中的韩芦生一样执着和阳光，让初心的种子发芽长大蔚然成林。

来稿作者：茅震宇，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个人小说集《街上樱花开》等，现任太仓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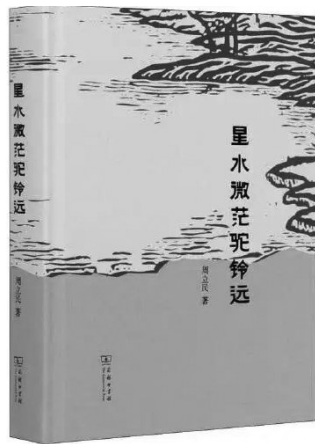
“时间不能拆借，此时生命让他们承受的是老和病，然而，那些‘堵塞’在咽喉里的话又是什么呢？我们又知道他们内心有多少不甘吗？都说沈从文甘于寂寞，可是读着他书信中那些激愤的言辞，你永远都不会这么想，他是不得不寂寞啊！巴金呢？他又甘于那样飞来飞去、迎来送往吗？《随想录》中有多少他的悔和痛啊，但这一肚子话，即便是没有交谈障碍，他们又能说得完、说得出口吗？”这一连串的追问，掷地有声，且声声震耳，引导读者自己去揣摩、去感悟两位老人那未能说出口的万语千言。

《星水微茫驼铃远》是适合细品慢读的书，因为书中的每一处引文都大有深意存焉，值得反复咀嚼、玩味，还有潜藏在字里行间的淡淡的忧伤，读得快了就体会不到了。幸好我手头这一册是毛边本，边裁边读，一边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人物的命运、艰难的抉择、苦涩的结局，一边感叹这命运之吊诡、选择之无奈、结局之可悲。比如，作者写诗人卞之琳这一篇，洋洋洒洒共有9个章节，且书名中的“星水微茫”和“驼铃远”都出自卞之琳的诗句，可见情之所系念兹在兹。要写出这位生活在新旧两个时代的大诗人一生的坎坷遭际并非易事，从年轻时“风度翩翩”的“精神贵族”，到办事能力不容小觑的《水星》刊物编辑，从抗战时期奔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到解放后执掌中科院外文所西方文学研究室的“局级干部”，究竟哪一个才更接近真实的卞之琳？特别让我赞叹的是周立民对待历史人物所秉持的严谨态度，他自信“笔笔有来处”，通读全文，可知此言不虚，作者引用卞之琳的每一首诗歌，都详细标明了在《卞之琳文集》中的出处，文中涉及巴金、徐志摩、沈从文、朱自清、辛笛、黄裳、季羨林、何其芳等同时代人的回忆文字，也都不厌其烦地注明出自何书何卷。作者阅读面之广、阅读量之大、读书之细致都让人心生敬重，谁说只有写学术论文才是做学问，在

在我看来，像周立民这样贯通文史、持论有据的写作，才是真正的做学问，而且是活泼灵动的有生命力的学问。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周立民是那种以虔诚之心对待文字的写作者，他坦言自己常常是“听着细雨声，工作到凌晨”，他把巴金以及他同时代的文化老人视为“一座富矿”，认为直到今天“这座富矿资源丰富，依旧可能给我们提供能量。离开他们，我们读不懂中国，也不会找到前行的方向。”并立下宏愿“将来好好为新文学写一部文学史”，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他用心用情锤炼出的文字里，我们还将更多地感受到那一代人的精神温暖。

来稿读者：周洋，现居上海浦东。





思考人之所以为人

文/夏学杰

1930年凯恩斯做出预测，在一个世纪之内，人均收入将稳定增长，人们的基本需要将得到满足，工作时间不会超过每周15个小时。现在怎样呢，很显然，凯恩斯错了。尽管人均收入确有增长，但我们却似乎越来越不满意自己的生活，工作时间也变得越来越长。剑桥大学人类学教授詹姆斯·苏兹曼在《工作的意义》一书中试图去思考解决这一谜题，挑战关于工作变革与人类进化的固有假设。苏兹曼融合了人类学、进化生物学、物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表明虽然我们费尽心力通过工作寻找快乐的意义和目的，但是早在原始社会，我们的祖先就已经过上了工作时长远少于现在但是足够充裕且闲暇的生活。当代社会将人物化为工具，鼓励持续工作以满足经济的无限增长，究其原因，就在于稀缺经济学的引导。人们担忧资源稀缺，因而勤奋工作变得重要，人也变得越来越忙碌。

凯恩斯认为人类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古典经济学家所说的经济问题，也被称为稀缺性问题。他的理论认为人是被贪婪的欲望所诅咒的理性动物，但由于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所以一切资源都是稀缺的。我们有无限的需求，而所有资源都是有限的，这一观点是经济学的核心，经济学研究的是人们如何分配稀缺资源来满足需求和欲望。这一观点还支撑着我们的市场、金融、就业和货币体系。因此，对经济学家而言，稀缺性是驱使我们工作的动力，因为只有通过制造、生产和交换稀缺资源，我们才能弥合无限欲望和有限资源之间的鸿沟。稀缺性问题容易导致我们对人类这

个物种做出悲观评价。悲观者认为，进化已经把人类塑造成了一种自私的生物，一直背负着无法满足的欲望包袱。

苏兹曼花了近30年前往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等地，深入研究原始部落。原始部落的人们组织经济活动的前提是对大自然充满信心，相信大自然肯定会赋予自己充裕的资源，而非过于关注资源稀缺性，所以物质欲望很少，不经常储存食物，不关心积累财富或地位，几乎只为满足短期的物质需求而劳动，很少有人每周工作超过15个小时，狩猎采集的劳动成果都在部落成员之间平均分配，大部分时间用来休息和休闲，并把闲暇时光完全用在我们认为没有意义的事情上，比如白天散步、聊天，夜晚围着篝火唱歌、跳舞、讲故事。但他们非但不像人们普遍所想的那样生活在饥饿边缘，恰恰相反，他们往往营养良好，甚至比大多数工业社会的人寿命还长。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们的部落被称为“富足的原始社会”。

苏兹曼实地研究得出的结论与英国经济史学家格里高利·克拉克的说法颇有些相像，格里高利在《告别施舍》一书中说，公元1800年一般民众的生活并不比公元前十万年的一般民众优渥。无论从哪一方面看，生活品质均毫无进展。人们在1800年的平均寿命不比狩猎采集时期长：只有30至35岁。石器时代人类的身高（一种衡量饮食品质及儿童患病率的指标）甚至高于1800年时的。石器时代的采集者从事少量工作即可满足物质所需，1800年代的英国人却得拼命一辈子，才能够得起码的舒适。格里高利甚至说，一般采集者的饮食和工作生活，远比1800年的英国典型工人丰富多彩——尽管当时英国人的餐桌上多了茶、胡椒和糖等舶来品。

苏兹曼指出，本书首要目标是缓解“稀缺经济学”对我们工作与生活的钳制，削弱我们对经济增长的过度关注（这种关注是不可持续的），促使人们意识到许多支撑当前经济制度的核心假设其实



古典植物在文学的土壤开花

文/钟 芳

植物与传统文化密不可分，在我国古代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中，记述了很多植物。作为文化和文学的源头，中国上古神话博大精深，遍布着各类奇树异草，它们有着怎样的来历和故事？它们究竟长什么样，又都有怎样的神奇之处？五色神石编著的《中国古代神奇植物图鉴》（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6月）一书以古代各个时期神话中的植物为蓝本，通过博物艺术相结合的超美图鉴形式，客观地为读者描绘了一个妙趣横生、五光十色的精灵奇幻世界，生动地描述了古代先民的社会生活图系，并对以上这些问题，给出了自己的一份解答。

全书共收录40种极具中国古代文化标签意义的神奇植物，它们大多来自《山海经》《西游记》《酉阳杂俎》《博物志》《洞冥记》《述异记》《海内十洲记》《神异经》等诸多神话典籍，每一种植物背后都有它们自己的神妙故事。作者将它们以博物学的绘制方式和故事情境化的文字讲述，从文学、艺术、生物、地理、自然、民俗、神话、志怪、典故、历史等角度给予生动直观的再现，配合170幅左右的精美原创彩绘以及有趣的故事内容，对其进行考究和编写。文字部分，既有文献原文呈现，也有通俗易懂的民俗故事；植物图绘，既有恢弘大气的主观呈现，也有精美细腻的局部特写，使读者在获取知识之余，也能有赏心悦目的视觉体验。

本书讲述的第一种神奇植物是“太阴之精”，这种树外形长得像芭蕉，不开花不结果，每到月圆之夜，叶片便舒展开来享受月亮精华，因此被命名为太阴之精。太上老君偶然得之，将采下的叶子

都是农业革命的产物，并且在人们向城市迁移的过程中被放大了。意识到这一事实之后，我们就可以放飞思维，设想一个全新的、具有现实可行性的、更有可持续性的未来，从而驾驭未来的挑战，利用自己无尽的能量、强大的决心以及非凡的创造力去塑造未来的命运。苏兹曼还表示，当然，狩猎采集模式绝非我们的选项，但这些狩猎采集社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让我们去理解一个不再受制于经济问题的社会是什么样子。这些原始部落不仅提醒我们认识到现代人对待工作的态度是人类向农业过渡以及向城市迁移的产物，还提醒我们认识到要实现更好的生活，关键在于解决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以便降低自己的物质追求，用凯恩斯的话来说，这样一来，“我们将再次更看重目的而非手段，更看重美好之物，而非有用之物”。

“时间就是金钱”这个名言的作者现在常被认为是富兰克林，苏兹曼考证，它远比富兰克林那封著名的信要久远得多。关于这句话，最古老的书面记录是《论商业与完美的商人》。这个大部头著作出版于1573年，作者是出身于克罗地亚的商人本尼迪托·克特鲁戈里。“时间就是金钱”这一观点其背后蕴含的情感则要悠久得多，就像我们当代的工作态度一样，也起源于农业时代。

书中还展望了一下智能化时代的工作。苏兹曼认为，自动化技术的到来使我们再次处于历史上一个相似的变革时期。如果机器人代替人去做重复性的工作，那么人在多出的时间里做些什么才能更有价值？他认为，自动化有可能彻底改变人与工作的关系，他希望，我们能够以富足的原始社会祖先为借鉴，思考人之所以为人，而不是工具的意义。这种从工具人思维向“人”的转化，才是他写作本书更真切的建议。

来稿读者：夏学杰，现居吉林柳河，供职于柳河县电视台。



制成宝扇。《西游记》第59回里，唐僧师徒遇阻火焰山，听灵吉菩萨说，当年结拜大哥牛魔王的夫人铁扇公主，有一件灵宝，乃太阴之精叶，一扇熄火，二扇生风，三扇下雨，可破熊熊火焰山之火！孙悟空喜出望外。

在讲解“护门草”时，作者将其描述为“护门草叶缘呈波浪形，花色紫红艳丽，未开的花苞是长卵形，形状像耳朵；全开的花，花心中空，形状像人嘴。所以，白天的时候，护门草在门前安安静静地聆听着，到了夜晚，无事时继续不声不响，主人可以安睡，一旦出现坏人，它就会发出响亮的声音，警醒主人恐有人祸。”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九介绍了这种异草：“护门草。常山北有草，名护门。置诸门上，夜有人过，辄叱之。”这样能看家护院的奇草，甚是惹人可爱。

“又东二百里，曰姑嫜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为瑶草，其叶胥成，其华黄，其实如菟丘，服之媚于人。”《山海经·中山经》里的瑶草据说是炎帝女儿瑶姬死后所化，其叶片一层层地紧密生长在一起，黄色的花朵点缀在繁茂的叶片之间，结的果实很像一种叫菟丝子的寄生植物，吃了它就能变得明艳好看，招人喜爱。瑶草随后又修炼成形，成为巫山神女，附会在长江三峡的一块矗立云端的巨石上，都说那块巨石是巫山女神，她好似远眺江边，在等待什么人。她的形象至今民间还继续在流传。

不死草是神话传说中可让人起死回生的草，因其色彩丰富、造型独特、效果非凡，所以很多仙人都会到高石沼采集食用。秦始皇战乱时期曾出现过不死草，许多百姓在战乱中惨死，惊动了上天，有神鸟飞来，嘴里衔着不死草，盖在死人脸上一会儿，人就能马上复活，可谓奇景。东方朔《海内十洲记》中记载：“祖洲近在东海之中，地方五百里，去西岸七万里。上有不死之草，草形如菰苗，

长三四尺。人已死三日者，以草覆之，皆当时活也。服之令人长生。”

生长于太阳升起的地方，九千年才成熟一次，味道甘甜香美的扶桑树；又名草还丹的人参果，只要闻一闻果子香气，就能多活360岁；吃了便可以长生不老的蟠桃；蚩尤死后，其桎梏所化而成的枫木；夸父手杖化身而成的邓林；可以美梦成真的梦草……迎面邂逅这些富有个性的宝藏植物，用如今的眼光来看，颇具有玄幻的色彩。但万物皆有灵，这些神奇植物并不是凭空虚构的想象，它们的产生与中国古老文化紧密相连，更多的是表达一种敬畏、信仰，一种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中国古代神奇植物图鉴》既是植物百科图鉴，又是博物民俗知识，可读性与趣味性兼具，因而它是一本适合家庭收藏和共读的中华文化通识读本，打开便可以穿越历史长河，领悟感受中国先民智慧和华夏文明的至美想象力，从而享受思维与艺术上的双重碰撞，找到生命的动力。

来稿读者：钟芳，现居湖南怀化。

“与编辑书”中的温情表达

文/刘学正

要想深入了解一位作家，除了所创作的作品，其与编辑的往来书信亦不容错过。作为一种富有仪式感的沟通方式，书信往往是友谊渐进的载体，传递出厚重的情感。在《文学的荣光》一书中，作者史鹏钊以陈忠实、贾平凹、邹志安与《飞天》杂志编辑李禾的书信为主线，通过细致地梳理与串联，讲述了三位作家于20世纪80年代前后步入文坛时的境况，由一封封长短不一、充满温度的“与编辑书”，可窥探他们内心世界与精神气度。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对给予作者无私扶持的编辑，曾作如此表述：“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坦然隐在名声、荣誉的背后，这样的老师，每当想起他们的名字，我永远心怀敬意。”

“创作难，在我则更难。前半年只写了四五篇东西，没一篇好的，我很苦恼，要前进一步，真不容易。”1980年，陈忠实在写给李禾的书信中，毫无保留地倾诉创作中的烦恼，甚至诚恳地写道：“我是一个老业余作者，早已练成了接受退稿的功夫，你不必因稿拙而为难。”陈忠实把自己对文学的追求，形容为农民对作物丰收的追求，虽然时而“歉收”，但他并不沮丧，“农民有一种极可贵的品质，绝不以一料庄稼的丰收或歉收而自足……应该聚足力气，去争取又一个秋收了，而春光是短暂的。”2016年，在得知陈忠实逝世的消息后，李禾悲痛地写道：“老哥现在走不了路，出房子都困难，你就原谅老哥不能到灵堂送你吧！”

“把127张退稿签全贴到墙上，抬头低眼看到自己的耻辱”是贾平凹刚踏足文学路时的真实写照。1977年，当他接到李禾商量改稿

的来信后，心里异常激动，不仅在回信中表示自己是“不烦删改的”，还说：“我虽经常写些小文章，但的确在各方面幼稚得很，衷心希望你们往后多加指导，使自己进步得更大些。”后来，李禾接连编发了贾平凹的几篇小说，彼此交流也就多了起来，而这也鼓舞了贾平凹的写作。一年后，在向李禾投寄《牧羊人》时，贾平凹在信中写道：“得到您的热情支持和培养，是我终生未能忘却的。在新的一年里，盼仍得到您的指导，望能对我的每一篇习作，提出多方面的批评意见，这全是心中实话！”

作家并非生活在象牙塔，其创作要承受住外界的干扰，这在邹志安写给李禾的信件中可见一斑。“我今年的境遇不佳，先是我的妻子棉酚中毒，继而我的小侄子又死于非命；老母年高，又要我侍奉和安慰……因此一年之中，几乎无心创作。”邹志安性情耿直，工作上也时有不愉快，愤怒、苦闷，没人能听他的诉说，他就在信中给自己尊敬的杂志编辑加老乡，絮絮叨叨地陈述事情的经过。1993年，邹志安因病早逝，这激起了社会各界的巨大同情与深切怀念，《文学报》更是发起募捐活动，筹集资金替作家偿还在世时的债务。史鹏钊认为，作家对文学神圣事业的不懈坚持，才留给了一个时代最富有的精神食粮；而编辑会带着盛情为作家们缝制踏上文学多彩大道的嫁衣。

作家的“与编辑书”，写作时并非为了发表，所以有着异于公开作品的温情表达，而将这种私密性的文字集腋成裘，流露出的是浓浓的人文情怀。透过这些片纸只字，我们可以感受编者与作者在相互成就中的温度和力量，触摸到文学在时光冲刷里愈加夺目的荣光。

来稿读者：刘学正，现居山东聊城。

奔跑吧，一百里！

仇进才

在被戍边战士陈祥榕那句“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深深感动后，我便关注了新疆军区的公众号“喀喇昆仑卫士”，也因此见证了这些最可爱的人，用100里接力跑庆祝建党100周年。

在祖国最东端的黑瞎子岛上，五星红旗定义了注目与敬礼的高度。当流云擎着晨曦卷过哨所，当战鼓先于朝阳敲响，他们站在起跑线上，像是一张被信仰用力拉开的弓，铆足了信心与力量。眼中，是从1921到2021，用一百里去借代一百年的光荣与热忱。

一声令下，旭日升起；一声令下，脚步出征！

这一百里，有乱石滩，有长满荒草的原野，有跨越浩渺水域的桥梁，有现代化的辽阔公路，更有让战士忍不住停下来亲吻的界碑。这一百里，从营党委书记到连党支部书记，从预备党员代表到入党积极分子，曾经授予过党徽的手再次递来接力棒，唯一不变的是清澈的爱永远滚烫而鲜红。

在无人机的远镜头中，他们分外渺小，渺小得像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一朵不起波澜的浪花，从高空俯瞰，奔跑的速度也并不快，更像是一点点的挪移。但所有艰苦的使命，放在历史的视角里，不都是如此一点点地被完成吗？点点的星火，最终燎原；一点点地发展，最终崛起。也正是无数个他们，牢牢地守住了中国的大门，用一米八的身高占据地图边界线上所有的比例尺，气吞山河的呐喊塑造了中国最坚实的音色。所以，即便隔着万重山，我依旧能听见那辽阔的公路上响彻的脚步和喘息声。这有力的节奏，必当是传承自乌蒙磅礴走泥丸的豪迈与乐观。

当方阵举着党旗冲过终点线，激昂的欢呼便有了飘扬一百里的风声与雷动。“建党百年，东极战位，有我在”，在这贫瘠、艰苦的边关，他们书写出了最丰富、最热血沸腾的生动。

在回看记录视频时，我突发奇想，把接力赛跑逆向，当作倒数的过程。倒数的起点便是目标的所在。因为你知道，你必将会跑完这一段路程，胜利只是一个终将到来的节日，惟一的区别只在于快慢。倒数是对自己的鞭策，时刻提醒自己绷紧生命的弓弦，用酣畅淋漓和竭尽全力去注解青春的璀璨与光芒，让初心与使命在理想的重点线后得到最好的诠释。

想来，这和中国梦的实现很像，伟大复兴是必然的结果，区别只在于前进速度的快慢。而一位位国家领导人便是领跑的人，带着全国人民在历史与未来里迎着朝阳奔跑。一代代地传承，一代代地接力，让党的指导思想不断地丰富，伟大事业不断地建树，伟大工程不断地推进。最终，习总书记在天安门城楼上对世界庄严宣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是的，它已奔赴伟大的前程，不负国人期。

所以，奔跑，是追逐的过程，也是实现的过程，更是抵达的过程。

我想，军人的生命离不开奔跑。他们在奔跑中促进了肌肉的成长，也让思想变得纯粹。杂念是负担，会分散精力，也让身体变得沉重。奔跑便是对杂念的摒弃，像铲子，用日积月累去铲除根深蒂固的不坚定与退缩。他们在奔跑中获得昂扬的自信，获得充实的愉悦，获得热烈的希望。他们的影子变得更加矫健，线条变得更加流畅，春夏在上面自然而然地瓜果熟蒂落，一如汗水，也包括心跳。

三表叔是从军队里出来的。上学时，有一年暑假我常住在老家，他便每天早上都过来，把我赶出被窝，带着我绕着村庄跑步。

唐朝的鱼

邱俊霖

鱼肉，不仅味道鲜美而且营养丰富，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喜爱的食物之一。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文人墨客们与“鱼”邂逅了自然也免不了要拿出纸笔赋诗一首，与好友们分享一下“鱼”中之趣。

一、唐诗里的渔趣浓

“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这首唐代诗人胡令能的《小儿垂钓》描写了一个头发蓬乱、稚气未脱的孩子坐在河边学钓鱼的情景。只见那孩子侧身坐在青苔上，青草遮映着他的身影，路过的行人想向他问路，他却路人大老远的时候便摆了摆手，害怕问路的声响惊动了鱼儿。这活灵活现的描写将普通的垂钓画面描绘的意趣盎然。

在唐诗之中，像这样的“渔趣”还有很多。例如唐代诗人沈佺期在《钓竿篇》中写道：“朝日敛红烟，垂竿向绿川。人疑天上坐，鱼似镜中悬。”原来，唐代的捕鱼人也会为了更好的收获而起个大早，迎着朝阳前往美丽的河边垂钓。旭日东升，红霞已渐渐消退，手持钓竿来到绿水边开始垂钓。河水清澈，人们坐在小舟之中如同坐在天上一样；在阳光的照耀下，漫游在河中的鱼儿就像悬挂在明亮的镜中一般清澈可见。沈佺期着重描绘自然景色，却又衬托了自己乐享自由的雅致。

诗圣杜甫在《水槛遣心·其一》中写道：“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天空中飘着蒙蒙细雨，水中的鱼儿摇曳着身躯，欢快地跃

没有一百里，但十里路也不远。做农活的人起来得都很早，时常能看见他们端着饭碗坐在门口，笑着望着我，挥挥手。有的还会大喊一声“加油”。我确实是需要加油的，往往一圈下来我就气喘吁吁了。而身后跟着跑的土狗却连舌头都没伸出来，天真地望着我，仿佛在说“你已经跑不动了吗”？

这一个月很短，但它却让我成功地瘦了一圈，而开学后的军训也能安然受之。最重要的是，它让我养成了坚韧、不服输的性格，让我日后经历更多的磨砺也能内化成生命的活力，屈指把胜利的终点不断倒数。

昨天，单位里发通知，也要举行一百里接力比赛。我感到一阵久违的激动——在建党一百年的伟大时刻，在那一条意义非凡的百里赛道上，我必将留下矢志不渝、奋勇向前的奔跑身影，让瞬间定格为永恒的光荣。

来稿读者：仇进才，现居江苏淮安。



出水面；在习习微风中，燕子掠过天空，划出了一道优美的弧线。这是一幅多么清新而美妙的画面呀，人们的情绪似乎也被一起带入了欢乐之中。

诗人白居易晚年时闲居洛阳，无事的时候便喜欢观赏池塘中的鱼儿，而且还热心的为鱼儿投食。只不过他在喂鱼的时候却遇到了顽皮的孩子，于是写了一首《观游鱼》来吐槽：“绕池闲步看鱼游，正值儿童弄钓舟。一种爱鱼心各异，我来施食尔垂钩。”这是一幅平淡普通的生活场景，白居易喂着池中的鱼儿，结果有的儿童却在池塘边钓鱼。于是白居易抱怨道：“我给鱼喂食，盼望它们长大；你们却在旁边钓鱼，满足自己的快乐。”

二、有种鱼不能乱捕

唐诗里的渔趣虽然浓郁，唐人们也以钓鱼为乐，不过在唐代，鱼可不能乱捕，比如鲤鱼。

至于为何不能捕鲤鱼，盖因唐朝的皇帝姓“李”，吃鲤不就是“吃李”吗？所以鲤鱼不仅不能吃，还获得了一个霸气的名字——“赤鯪公”。统治者对鲤鱼的推崇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鲤鱼成为了当时最为“尊贵”的鱼。在唐朝之前，兵符通常都是“虎符”，而唐朝统治者认为鲤鱼是符瑞，于是用铜鱼符取代虎符，成为了征调军队时的凭证。

或许，正是因为鲤鱼在当时地位“显赫”，因此成为了许多唐代诗人歌颂的对象。比如中唐诗人章孝标在《鲤鱼》当中便说：“眼似珍珠鳞似金。”直接用珍珠和金子来描绘鲤鱼的形象。

而李白在《赠崔侍郎》中更是用鲤鱼来自喻：“黄河三尺鲤，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李白在诗中直截了当的将鲤鱼当作不是凡鱼能够比拟的珍贵鱼类。当然了，说到底，李白

终究还是在发牢骚，通过自比鲤鱼来从侧面表达自己怀才不遇的苦闷之情。

这还不算，唐朝中后期的志怪小说家段成式在短篇小说集《酉阳杂俎》中提到：“国朝律，取得鲤鱼即宜放，仍不得吃，号赤鯪公（鯪 huàn，同“鲩”），卖者杖六十，言鲤为李也。”说的是按照唐律，捉住鲤鱼必须当即放生，而且还要尊称其为“赤鯪公”。倘若有人贩卖鲤鱼，还得挨六十下板子。

虽是小说桥段，但其背景必定有事实依据，作为李唐王朝的“国鱼”，捕食鲤鱼无疑为统治者所忌讳。《唐律疏议》中虽没有关于捕食鲤鱼的详细规定，但《旧唐书·玄宗纪》中提到，开元三年（715年）“禁断天下采捕鲤鱼”，开元十九年（731年）又“禁采捕鲤鱼”，也就是说，唐玄宗在位期间曾两次下过捕鲤禁令。

由此可推测，禁止捕食鲤鱼或许并非成文规定，但唐代统治者曾以禁令或其他形式对鲤鱼进行了有意识的保护，鲤鱼的确是那个时代的重点保护动物。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令人尴尬：或许是因为实在太好吃了，许多人还是冒着挨揍的风险偷偷吃鲤鱼。

比如“诗佛”王维在《洛阳女儿行》当中写到“良人玉勒乘骢马，侍女金盘脍鲤鱼。”这是写洛阳一位大户人家的女子，她的婢女捧上黄金的盘子，里面盛着精细烹制的鲤鱼。看来唐朝统治者确实低估了吃货们的“战斗力”。

三、唐人吃鱼花样多

说到鱼，自然离不开“吃”！除了鲤鱼，各式各样的鱼都有可能成为唐代吃货们的盘中餐，当然了，唐代人对于鱼的吃法是十分讲究的。现代人喜欢用荷叶包裹鸡肉或是猪肉，做成香喷喷的荷包鸡或者荷包肉，而有些唐代人则用荷叶包裹鱼，做成美味的“荷

包鱼”。

唐代书法家张旭很会吃，当时的诗人李颀就写了一首《赠张旭》，诗中从多种视角来展现张旭的精神风貌。其中便写道“荷叶裹江鱼，白瓯贮香粳。”用新鲜荷叶包裹江鱼一起蒸熟，荷叶的清香与鱼肉的细腻完美融合在了一起，而且还给人增添了一份“鱼戏莲叶间”的情趣。

稻米也是唐代的主食之一，“诗魔”白居易在《舟行（江州路上作）》中也写到：“船头有行灶，炊稻烹红鲤。”用大米饭裹着红鲤鱼一起在船头蒸熟，大白米饭与河鲜的碰撞一定给白居易带来了最美妙的味觉享受。

除了蒸“荷包鱼”，唐代的人们还喜欢吃“鱼脍”，脍指的是生肉，所以鱼脍就是生鱼片。唐代人不仅十分热衷于吃生鱼片，而且还认为这是鱼肉最高端的食用方式。

唐代宫廷中就有一道名为“金齏玉脍”的名菜，齏(ji)就是捣碎的佐料。这道菜以鲈鱼为主料，桔瓣为齏，将鲈鱼肉切成薄细片，再浇上桔汁，肉质细嫩鲜美，成菜时如金似玉，鱼肉鲜嫩，清香爽口，是当时的天下第一鱼生。

曾是唐玄宗身边大红人的李白就有幸品尝过这道菜，后来他回忆起来的时候还专门写了一首诗称赞到：“吹箫舞彩凤，酌醴脍神鱼。”在李白眼中，这道“金齏玉脍”就是当之无愧的“神鱼”。

大诗人杜甫也对生鱼片大加赞赏，在交通和保鲜技术不发达的唐代，生鱼片是十分昂贵的，杜甫一般也负担不起吃鱼脍的费用，好不容易受邀参加了一个“高端局”，终于吃上了一回鱼脍，于是，杜甫将生鱼片从取鱼、切肉到进嘴的过程都记录了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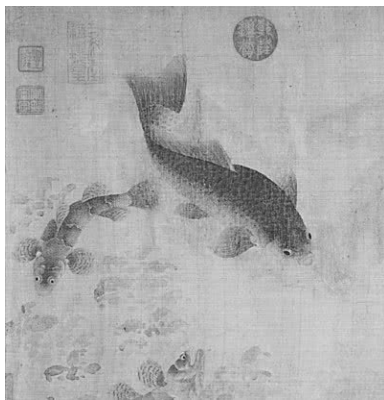
对于鱼脍的滋味，他这样评价：“无声细下飞碎雪，有骨已剝觜春葱。”（《阆乡姜七少府设脍，戏赠长歌》）无色细下是形容刀

工精湛，而“碎雪”是用比喻的修辞手法衬托鱼肉的白嫩。但遗憾的是“放箸未觉金盘空”（《阆乡姜七少府设脍，戏赠长歌》），杜甫还没吃过瘾，盘子就见底了。

看来，鱼脍的美味令唐代人无法抗拒，像王昌龄、白居易等大诗人，也都是鱼脍的忠实粉丝。王昌龄在《送程六》当中写到“青鱼雪落鲙橙齏”。白居易在《和微之诗》当中也写到“鱼鲙芥酱调”。这些诗句介绍了唐代诗人们吃生鱼片时的调料，其中有芥末酱料，同时也有橙子等酸味的水果，这多多少少是在模仿宫廷内的吃法，这样不仅可以给鱼肉去腥，也能让鱼肉的滋味更加丰富。

透过唐代人的诗句，我们仿佛能够穿越时空，感受到那时“鱼”味之鲜美。唐朝的那些“鱼”似乎跨越了千年时光，却依然在牵动着人们的味蕾。

来稿读者：邱俊霖，现居江西赣州。



我与成都图书馆

丨刘春霞

成都图书馆门口有一棵高大粗壮的银杏树，如果秋天去的话，我爱在树底下站一站，然后等风来，看银杏叶慢悠悠地掉落，落在我身上，也落在巴金雕像上。

一楼的玻璃展柜，陈列着许多现代名家手稿，其中有巴金的《家》。走进巴老的字里行间，对巴老渐渐熟悉起来，他仿佛就像隔壁的老爷子，此时在李家院子默默思索着。

图书馆二楼有两间屋子是文学馆，这里，是我次数来得最多的地方。童年时，由于所处环境，无书可看。走到人生的某一段时，我突然想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但发现自己读的书太少了。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频频光顾成都图书馆。有时，整个文学馆除了工作人员，只有我一个人，阳光从落地玻璃窗射进来，照在一排排高大的书架上，光线里的尘粒在热烈飞舞，像一个个金色的字，四周的一切是静的。我捧着书坐在窗台上，一动不动，一种奇异的感觉升上心头。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凭借文字穿越千年风尘、跨过万里长空，而我刚好在这里——成都图书馆，遇到他们了。我向他们打招呼，他们不说话，只是看着我笑，呼唤我走进他们的精神世界。最初，萧红天真般喃喃自语式的语言风格，让我格外喜欢。“蒲公英发芽了，羊咩咩地叫，乌鸦绕着杨树林子飞，天气一天暖似一天，日子一寸一寸的都有意思。杨花满日照地的飞，像棉花似的。”我不止一次在写文章时用这样的句式，写到我的童年里的蒲公英、水牛、麻雀以及槐花和苦楝子树。后来我迷恋上沈从文《边城》里那优美的笔触和细腻的情感，亦散文亦小说的情味影响着

我。再后来，我为《斜阳》作者太宰治的屡次自杀，最终第三次自杀杀掉而大惑不解。当我看到瞎眼的乌尔苏拉坐在一场暴雨后成了汪洋之地的屋子里，任凭他的孙女捉弄她的时候，我大哭了一场，为谁而哭？为她吗？为马尔克斯？还是为我自己呢？我不知道，也许，什么也不为。很长一段时间，我往返在家和成都图书馆之间，我的精神世界自由又多彩。

三楼的大自习室里长期人满为患，连屋外过道上的桌椅也坐满了爱学习的人。我经常混迹其间，有时是坐在那里读书，有时是写点文章。有时是一个人去，有时是带了孩子去。我曾接受图书馆节目制作组的采访，问我喜欢来这里的原因。我喜欢这里浓厚的读书氛围，温和的工作人员，不管内心多么躁动，只要一坐在这里，整个人就变得安宁。所以我爱来这里。

成都图书馆创建于1912年，迄今已历109载春秋。其名称由最初的四川图书馆一路变更到现在的成都图书馆，几易馆址，从人民公园到现在的文翁路，可谓历史悠久。我去过四川省图书馆，金牛区图书馆、成华区图书馆等几个图书馆，它们的建筑外形极富现代时尚感，内部藏书众多，各种高科技设施更是先进。相比之下，成都图书馆就略显低调，屋舍老，楼层少，连里面藏书也是旧的居多。可是，我喜欢去成都图书馆。我是一个怀旧的人，对于旧的东西，我都喜欢。我总觉得，旧的东西里有历史有情怀，是有温度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附近的老年人也爱来这里，有好几次，我来晚了一些，自习室早已没有座位，我去了四楼的报刊阅览室，里面清一色的老年朋友在安静地翻阅报刊，有的还在小本本上认真地记录什么呢。

我注意到一个很老的女人，满头的银发。她常常来图书馆，她读书看报极专注，不时用舔湿了的手指去翻书，翻得哗哗作响，读

宫凤华

竹床上望夏月

到有趣处，露出幸福的笑。这一刻，我不由得想起了博尔赫斯的那句话：“如果有天堂，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是的，我想，当一个人在喧嚣的人世间，抑或是走过奈何桥，喝过孟婆汤后，能找到精神的天堂，从此不再孤独，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成都图书馆以她平易近人的外貌，历经沧桑的柔和心态，接纳所有人的到来。只要你愿意，不管你是贫穷还是富有，聪明还是愚钝，每个人都能在这里找到精神栖息地。而我，将一如既往地去做成都图书馆，习惯性地到巴老的雕像前站一站，然后像回家一样，坐在窗明几净的自习室里，体验书香带来的愉悦，感受文学带来的力量。

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个秋日的午后。我坐在自习室里，阳光斜着进来，照亮了我对面小伙充满朝气的脸，他软嗒嗒的书包带在桌面上形成了一个很大的“V”型阴影，他专注地在读着一本书，名字叫《人类的进化》。

来稿读者：刘春霞，四川散文学会会员，成都市作协会员，四川散文大观公众号编辑。

夏夜，斜躺竹床，凝望夏月，浪漫而惬意。而今栖居小城一隅，乡野纳凉望月，已近奢侈。

倾心清少纳言《枕草子》中风雅句子：“春天是破晓的时候最好，夏天是夜里最好，秋天是傍晚最好，冬天是早晨最好。”有如清风飒至，明月入怀。

闲暇归乡，晚霞凄美，夏夜姗姗来迟。故园木格窗外栀子飘香，荷风送凉，菰蒲凝绿，流萤冰蓝。

四方小院，土墙青瓦，院角有构树和柿树。丝瓜爬蔓，越过墙头。有麻雀在藤蔓间腾挪踢踏。院角木槿细碎地开，像无惊无澜的日子。晚风里，嚼着祖母的涨浆饼和薄荷粥，倏然觉得尘世仁厚可亲。

乡下小院是一只敞口器皿，盛满纯净月光。我们躺在竹席上纳凉，哼着古老的童谣，讲着离奇的故事，发出月光般的脆笑。院里的梧桐树和苦楝树如一幅清简的素描。地上投下诡异的象形文字。栀子沐着月光，恣意安然，倚风自笑。蛙声清透磊落，感觉这相濡以沫的田园是那般温情和善意。

院中竹床，年月久远，通身赭黄，纹理清晰，触之光滑。竹床沁凉，嘎吱作响，有如梦呓。应和蝉鸣蛙鼓，衬出夏夜的幽寂。

斜倚竹床，恍如置身一叶扁舟，水天一色，有苏东坡游赤壁的旷达与澄澈。有如张岱：“小船轻幌，净几暖炉，茶铛旋煮，素瓷静递，好友佳人，邀月同坐”的高雅风情。

此时，星光月色，乡野宁谧，襟怀坦荡，乡愁空旷无边。

横卧竹床，舒展四肢，神思飘忽，精骛八极，想起远古洪荒的一场

奶奶的“字典”（外一篇）

丨 蓝月凤

奶奶不识字，更不要说英文了，可是她始终都在关心着我的学习。

“小小啊，作业有什么不懂得？”奶奶经常会弯着腰过来问我，可当我问起她不懂的英语单词意思，她却摇摇头走了。

奶奶不懂这些，可每次照旧会关心我的学习和作业情况。一次，我做作业的时候，奶奶颤颤巍巍的走了进来，“休息一会儿吧，不要太累了。”她试图放下手中带来的玻璃杯，可不小心弄倒了，同时还把我的作业弄湿。她一边说着对不起，一边用手擦，只是越擦越湿。不懂事的我没好气的说：“奶奶别擦了，你这样会越来越脏的，而且奶奶你忘了我不喝牛奶的吗？”

“忘了忘了，是奶奶不好。”她满脸的愧疚，我却不以为意。到了吃午饭的时间，我到处寻不见奶奶的身影。这时，才想起刚刚奶奶离开房间时那个愧疚的表情，于是赶忙出去寻找。

可找遍了整条大街都没看到奶奶的身影，就当往回走的时候，突然看见奶奶在隔壁房子面前发呆。“奶奶，不是说了你不要到处乱跑吗？”说完就拉着奶奶的衣服打算带她回家，奶奶却似乎没听到一样一动不动，一直看着门牌号。

拉扯间，奶奶手里的东西不小心掉了。那是一本英语字典，她低着头很生气的说：“你干嘛呢？这可是给我小小用来学习的。”说完便弯下腰捡了起来，心疼的把折了的角给抚平。那一刻，我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眼眶微红。

奶奶的记忆越来越不好，可唯独记得我的学习。她刚刚一出

战事，想起诗经时代的一场旖旎情事。有时青露沾额，浸着草木馨香，是乡村与童年杂糅的糖果的凝噎，贮藏着童年的温存与绵远乡情。

躺在竹床上，犹如躺在青纱帐里，躺在紫云英地里，躺在苍莽的芦苇滩上。无边的风月，甜美的怀想，立时把我淹没。天空蓝如海子，繁星随意散落，鱼鳞般吸附其上。娴静、舒缓，古典而温馨，夏夜多了一份幽渺的情韵。

夏月蹲在树梢上，如宋画中的婉约女子。月光随心所欲地皎洁着，流淌着，飘散着，热烈奔放，如川菜。静心凝望，能荡涤胸中所有的尘滓，心中一片波光旖旎。

面对清丽夏月，古典情结泠泠泛起，成溪成河，漫过琐碎的日常与仓皇的奔波。月下风物，清透的，素白的，沁凉的，朦胧的，宛若一阕词、一首诗，宛若一幅水墨留白，一曲《渔歌子》。秦观“携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倚胡床”的诗句翩然而至。

夏月干净，丰盈，静美，皑皑如雪，莹莹汪汪，俨然要滴下玉液来，我们如捧一盅醴泉酣酣地啜饮起来。月光包裹乡村，铺开原野，也滋生出我们清亮的乡愁。

我的乡愁，总在月光如洗的夜间，绵延发酵。躺在竹床上，感到时间很质感，星空很贴近，温润而柔软，我触摸到生活的轻盈。

想起松尾芭蕉的俳句：“章鱼壶中梦黄粱，天边夏月。”总让人觉得细腻处有些压抑，又会觉出它的一些情与趣。

在竹床上看霞光，望夏月，内心丰盈而柔软。让我们远离浮躁和功利，享受清风明月和乡音土韵。瓜棚豆架，浅酌低吟，夏月清凉，乡情弥漫，笛声一样清远。竹床上望夏月，我们会抵达内心的清明与平和。

来稿读者：宫风华，教师，江苏省作协会员，《文苑》《教师博览》签约作者，小说《秋月》曾获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



来，就忘了这里是什么地方，只能一个个问公交车站怎么走，书店的方向在哪。可她买完书后，又忘了回家的路。所以，这才出现奶奶一直在隔壁房子面前的那一幕。

字典外面是硬的，不好折，奶奶心疼的想抚平，可就是不平。我哽咽的说道：“奶奶，我们回家，该吃午饭了。”这时，她才回过了神，缓缓抬起了头，发现是我，于是赶忙将手上的字典递给了我，“小小，奶奶不识字。所以，给你买了这个叫‘字典’的东西，以后不会就可以查了。”

爸爸曾经说过奶奶的脑海中有一块“橡皮擦”，擦掉了部分往事。可奶奶却一直都记得我，一直在用她的爱来温暖着我。

“三轮车”的背影

我家院子里停着一辆早已生锈的三轮车，载满了我童年最“难堪”的记忆。

小时候，一放学就会在校门口瞧见那熟悉的红色三轮车。出于面子，我本想装作没看见，可父亲却眼尖地从人群中一眼看到了我，一边让我赶紧上车回家吃饭，一边还不忘和一旁的同学打招呼。

我只好把手上的书包扔进去，随后自己也坐了上去，并催促道：“赶紧走吧。”说完还不忘把衣服上的帽子戴上。父亲脸上原本的笑容渐渐消失，不紧不慢地骑上那上了年纪的三轮车。

第二天早上，父亲照旧骑着三轮车送我到学校。我没忍住开口，“你以后别来接我了。”父亲局促的说：“爸不是觉得你这样会辛苦吗。”我想都没想脱口而出，“我宁愿辛苦点也不想丢人。”那一刻，父亲默默低着头，愧疚得向一个被老师批评的孩子。

放学后，没看见父亲的身影，我暗自开心着。走到路口，看着

同学们一个个坐上校车，心想“什么时候可以不用坐那丢人的三轮车，坐校车多好。”没想到原本在车上的老师喊住我的名字，让我上去，我稀里糊涂的坐进去，也没问为什么让我坐，而是沉浸在坐校车的喜悦当中。

第二日，本想走路去学校，可是父亲却依旧执拗地让我坐三轮车。我强忍着怨气，不停地催促他快一点。

那天下午放学，看见父亲的三轮车停在学校门口，可人却不在。这时，校车又恰巧从我面前经过，我动了歪心思，“如果把这破三轮车扎破，是不是我就不用继续丢人了？”

身边的朋友一直劝我，可我实在不想继续丢人了。近乎怒吼地说：“你知不知道那天我坐校车是什么感觉？可比这三轮车好太多了，你快点帮我把这三轮车扎破。”

见朋友一下子就把轮胎扎破，我舒了一大口气，“嘿，真有你……”但当我转过头却发现身边的人却是父亲，我整个人都傻了。他红着眼，看着我，“那天的钱只够你坐一次，我已经把剩下的钱交了，以后再也不会给你丢人了。”父亲站起来，骑着那破旧的三轮车慢慢悠悠地走了。

父亲的背影就这样消失在我的视野内，我站在原地愧疚了许久。直到老师走过来告诉我父亲出现在这里的原因，“你父亲那天找到我，问我坐校车一个月多少钱……”老师后来的话我全然听不进去了，一直以来我都在羡慕别人，却完全忽略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

来稿读者：蓝月凤，现居福建福州，学生。



唯有书与老公不可外借

| 罗 鸿

书和老公都借出去过，真的，现在后悔莫及。

周末听见有人在楼下唤我，探身去看，见是陈哥，赶紧回头喊老公。“莫喊，我就是找你！”陈哥仰着脸，真诚得近乎伪装。我诧异地看着他，却见他诡异地笑了：“三缺一，把你老公借我们一下吧！”——这叫什么话？还有“借老公”的！不就是约我老公去打麻将嘛，通情达理如我，难道会不同意？打那以后，每逢周末，都来“借”，而且“仪式”越来越简单，打个电话、发个信息，说“借”就“借”了，甚至，有时悄无声息地，不说“借”也“借”了。“借”老公的倒很讲义气，到时间就归“还”了，让我还不好意思不同意“再借”。而借书的，常常就是让人无可奈何，甚至敢怒不敢言。

以前的得意门生考上大学了，人家来看我，还提着糕点、水果。我们闲聊，聊生活，聊未来，聊书，得意门生说：“老师，你借几本书给我看吧。”最初几次遇到这样情况的时候，我总会大方地把门生带到书柜前，自己选吧！门生欣喜地挑选，一会儿就选出一摞，我隐隐有点心疼了，赶紧去婉言阻止：“别贪多图快，你看完了再来？”趁机抽出来几本，心中却充满“力挽狂澜”的窃喜。

门生们后来看完没有，我不知道，眼看要开学了，打电话去问书，门生们已经忙着上大学去了，人家说寒假回来还。寒假确实也来过一些，但似乎都把书忘记了。人家毕业了还来看你，多好的门生，你还好意思惦记几本旧书？

家里的书借出去了，办公室里的书，更是守不住。我的办公室离洗手间很近，有朋友去方便前，总喜欢先到我桌上找本书去“作

伴”。起初，会打个招呼，后来把书带走了才补上“招呼”，还有的，被精彩的内容迷住了，就忘了“招呼”也忘了还书。有一段时间，《小说月报》出的长篇，分“上”“下”两期连载刊出，我常常发现“下”还在，“上”已经不知所踪，再过几天，“上”回来了，“下”却从此杳无消息……问了几个人，没问到书，反被教育了：“就几本杂志，看你那着急样！哪天谁看完了，肯定就还回来了嘛！”最终也没有几本被还回来，大家却都说我吝啬。

有一次，郑愁予先生来都江堰，我求来两本亲笔签名的诗集，一得意就去朋友圈晒图。这下好了，朋友们留言都想借，我回复，没看完，不借。人家一语中的，戳穿我的“吝啬”：“你不会同时看两本吧，可以借一本。”我能借吗？这要是弄丢了，我到哪里再找，老爷子八十好几了，还能第二次再到我们这个小城市？就算能再来，那我还有机会要得到亲笔签名的书？——咬咬牙，坚持不借，得罪人算了，承认吝啬算了，总比把书弄丢划算！这样一想，豁然开朗。

早知道这样，不如一直不借呢。曾经，在二十世纪末，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跨世纪文丛》，一套书，六十多本，方方的《行云流水》、苏童的《刺青时代》、余华的《河边的错误》……中国当代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都有作品收入其中。那时候十多块钱一本，我节衣缩食，几乎快凑齐一套了，每天乐此不疲地守着看，度过了多少物质贫乏的日子啊……后来，书却被零散地借出去，再也找不回来了，多么痛心。现在去孔夫子旧书网查，要三千多块啊，还是别人抛弃的旧书！真不该借书出去，大多数有借无还。也不该“借”老公，“借”他出去，把时间耗在打麻将上，输钱，输健康，还不如回家读书，书也可以少弄丢几本。

来稿读者：罗鸿，现居四川都江堰。



小屋的回忆

丨 甘国栋

创建于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马尔康森工局（现阿坝州马尔康林业局），位于高原新城马尔康嘎辉桥的梭磨河畔。

其原转运站右前方、距梭磨河岸20米左右处，建有一幢上为两分水木质房架、下为一层内走廊的瓦房，其间隔成若干间住房，每间面积也不过10平方米左右，房内天花板及四壁均以木条钉成，再以铡成寸长的谷草拌和泥浆糊就；地面则以泥土平整而成。自1959年我父亲自川西森工局调入新组建的阿坝州林业局劳动工资科工作后，一直住在该栋瓦房临河最靠上游的那间小屋内；同年，我母亲自忠县来到马尔康，且承蒙马尔康森工局安排到农建队种菜后，仍未更换居所。

我1961年秋初中毕业于四川省忠县三汇初级中学。于1961年12月9日辞别故乡，由大伯父送到忠县城登上轮船，再次到了马尔康，入住那间面积虽小，但终生难以忘怀的房间——

那是一间团聚的小屋

解放后，我们家因无土地、无财产，阶级成分被划定为贫农，父亲也得以于1951年2月被乡亲们敲锣打鼓欢送参加了革命工作——先在万县接受短训，再被分配到川东伐木公司，曾在乌江因乘坐的木筏解体而坠落滔滔江水之中，接连漂过几个险滩后侥幸爬上岸来，算是捡了一条命；后川东伐木公司撤销，遂调至位于理县米亚罗的川西森工局，先后在朴头乡梭罗沟内的303伐木场和局本部工作，自然与家人分多聚少。

母亲虽也曾于1954年春节后被父亲从忠县老家接出来，被安顿在灌县（即现在的都江堰市）太平街居住，但也只有严冬伐木停止，父亲才会“下山”与母亲短暂团聚。1955年爷爷、奶奶先后仙逝，母亲便再次回到忠县。适逢大跃进、人民公社那个年代，她还远离家乡参加了“大炼钢铁”，直至1959年才被父亲接到马尔康居住。

正因如此，虽然我1960年暑假曾独自一人乘轮船溯洪水暴涨的长江而上，搭乘火车到成都，再坐马尔康森工局的大货车，一路行经汶川、理县干旱河谷，翻越白雪皑皑的鹧鸪山，穿过波涛翻卷的梭磨河大峡谷，历经艰辛方抵达马尔康探亲短住，但严格说来，那个令人难忘的1961年12月，才是我们一家人真正团聚的日子；而那间小屋，则为我们万分珍惜的团聚提供了难得的住所！

那是一间温馨的小屋

房子虽小，但父母充分利用房外就是空地的优势，趁着星期天，到地处现马尔康车站处的农建队对面山沟内背回工人们弃用的木板，搭建了一个“吊脚楼”，有效扩大了使用面积——在“吊楼”上摆放炊事用具，权当厨房；屋内，一左一右安放了一张双人床和一张单人床，一举解决了煮饭、住宿的大问题。有着“先见之明”的勤劳的母亲，在我来之前，已经在森工局工具厂后面荒坡上种了洋芋且收获颇丰，加上经过父亲努力，马尔康森工局于1962年初即安排我到局职工医院材料室工作，也算有了“一碗饭”吃。于是，我们一家三口过了一段至今仍觉得很舒心的日子——早餐后，我们便各自上班；中午，大家回到家里，将一张简易办公桌当做餐桌，聚在一起吃饭；晚饭后，三个人到梭磨河畔的小道上一边散步，一边没完没了地摆谈发生于忠县的“龙门阵”……



1962年春节前，听说街上为配合“回收货币”的政策要卖猪肉等当年罕见的熟食品，我们也就加入排队的“长龙”，凭着父亲还算得上“高”的工资（每月60.5元），买回粉蒸肉等食物，过了一个“有肉吃”的快乐年；当时正值著名演员黄婉秋主演的电影《刘三姐》风靡全国，我们也曾买票观看，我则连看几场——以致乐感本就不错、记谱能力超群的我，都能够哼唱电影中那些插曲了。

后来，舞场也随即开放。每到周末，《花儿与少年》的交谊舞乐曲声，总会从马林局俱乐部里飘荡而出，为马尔康这个当年很小的城镇平添了生机与活力！

记得春节之后，父亲被单位派往松岗沟内的州级机关干部农场劳动，但星期天仍可以回家，我们虽不宽裕但心境舒畅的小日子得以继续，且至今令人难以忘怀。

那是一间难舍的小屋

当年，国家为克服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严重影响，开始实施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其中一项重要的举措是大幅精简压缩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州级机关还为之召开了“动员大会”。原本，我父亲的历史问题，早在1955年参加于成都市东珠市街进行的“肃反”运动时已经严格审查，并由党组织作出了“一般历史问题”的结论，仍留本单位工作——这已令他对党和政府感恩一生，于是，向上级递交了“自愿申请辞职”的报告，不久即被批准——不过，父亲的这一决定也使其付出了代价：粉碎“四人帮”后，党和政府“拨乱反正”、落实政策，规定“凡是当年非自愿申请辞职者，均落实政策，返原单位复职”，而父亲却因是“自愿辞职”，失去了这一机会；他也为之懊悔过，但理智让他冷静下来，接受了处理结果，并一直乐意领取国家

按月发放的“辞职补助”。

得知父亲辞职的消息，想到自此便要离开城镇到农村去生活，我和母亲也曾心潮起伏，但本为农村出来的人，要再到那里去，也并不觉得似“天塌了下来”。因此，当父亲在过去森工单位同仁的“出谋划策”之下，最终选定到号称“雪梨之乡”、“阿坝州江南”的金川县新咱沟口落户时，我们一家人还是坦然面对，并抓紧做走的准备：清理自己的衣服、杂物、书籍，捆绑单位按规定送给的木质的椅子、办公桌等不急用的东西；待到9月18日早上，再拆散两张床，捆好被盖，等待装车出发。

记得那时，我在室内不住走动，四处顾望；伸出双手，抚摸那十分熟悉的墙壁、门窗、灶头……一股莫名的心绪涌动心中。当车轮滚动、喇叭鸣叫之际，我仍然倔强地回头，睁大双眼，透过那扬起的迷眼尘土，将目光投射向那渐渐远去的平房，心中不住地默念：“别了，让我们家人团聚的小屋；别了，给了我欢乐的小屋；别了，我人生中一处颇有纪念意义的驿站！”

那是一间令人魂牵梦萦的小屋

在当农民的岁月里，金川人民给了在当地还算“文化人”的我当记分员、农技员、长期担任大队会计直至当了5年教书育人的民办教师的机会。期间，我无数次地忆及过那间小屋，想象过它的变迁，感叹过命运的造化！不过，还是要感恩命运的眷顾，给了我再走近那间小屋的宝贵机会——

先是1979年，我参加西南民族学院面向阿坝、甘孜、凉山三州招收在岗中学语文教师的统一考试，以高分且唯一民办教师的身份，被“破格”录取到该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函授）攻读本科学历。记得第一次面授于当年在马尔康进行，期间，我曾专门抽出时

间，骑自行车到马林局寻觅那间房子的踪影，但由于原本自马尔康森工局内靠山边穿过的刷（刷经寺）丹（丹巴）公路改道行走于梭磨河边，那栋平房虽然尚在，但那个临时搭建的“吊脚楼”已荡然无存——一种“失落”的心绪油然而生！

再是1980年秋季，我仍以民办教师的身份参加全州统一考试，且以最高分被马尔康师范学校录取——主要攻读大学课程，还兼顾普师课程的学习。1982年毕业后即留马师校，及至1993年底被州委、州政府调到威师校任职至2009年退休。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曾无数次骑车、乘车路过马尔康森工局，但即便是那栋平房拆除，企业“棚户改造”时那间房子处建起了高楼大厦，我也总会条件反射般瞄上那间小屋的位置几眼——漫长的岁月都未能淡化烙在心灵深处的那份眷恋！

虽然时光荏苒，但而今我依然难忘那间极其平凡、于自己人生却意义不凡的小屋。只不过，随着岁月如烟般流逝，自己的怀念已变得更为理性——

人生总要前行，留下的是连续不断的深深足迹。当年走进小屋，只是自己一度久违的家人团聚的温馨生活的起点；而后来离开小屋，方才是人生精彩纷呈的新故事的开篇。因此，对小屋最好的纪念，应当是依恋人间亲情、眷顾人生“节点”、憧憬美好生活。

于是，自己顿感欣慰、释然！。

来稿读者：甘国栋，四川省中学语文特级教师，四川省散文学会会员。